

蒙古族哲学 及社会思想史论稿

内蒙古蒙古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研究会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蒙哲史研究室

编 者 的 话

蒙古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的研究，是一项具有拓荒性的科学事业。两年多来，我区各民族理论工作者和业余研究人员，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发奋图强，勇于创业，以振兴民族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志气，开始搜集和整理思想史的材料，挖掘蒙古族在历史上所建树的精神财富，探讨蒙古历代的时代精华演变的特点及其规律，揭开了蒙古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研究的第一页。同任何新生事物一样，这些研究成果尽管有不完善的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提高，但是它根植于社会主义各民族人民的共同繁荣文化的心愿，而富有无限的生命力，前途是广阔的，灿烂的。她正以奇异的魅力吸引着人们的兴趣，受到人们的关怀。

为了扶植科学的幼苗，我们编辑了《蒙古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论稿》，共收56篇文章，分蒙文版(27篇)和汉文版(35篇)两种。在收编时，我们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文化的原则下，鼓励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支持探讨性的观点和看法，以促进学术讨论，推动研究工作的深入。

参加编辑工作的有：阿民、蒙和巴图、苏和、巴干、陈献国、哈·胡乐歌、布仁门德、孟和巴雅尔、乌·朝乐门、达林太、额尔德尼、那顺、满都呼等同志，还有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蒙哲史研究室的同志做了具体的编审工作。

限于编者水平，《蒙古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论稿》中缺点、错误难免，以期各民族读者指正。

《蒙古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论稿》编委会

1982年11月20日

蒙古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论稿

目 录

编者的话·····	(封二)
-----------	------

学 术 报 告

继承蒙古族的优良传统开展哲学史的科学研究·····	石 峻(1)
谈蒙古族哲学史的研究·····	陶克涛(4)
关于《蒙哲史》方法论的几个问题·····	蒙和巴图(12)

蒙 哲 史 论 文

论史诗《江格尔》中蒙古古代哲学与社会思想·····	满都夫(36)
《蒙古秘史》的哲学政治思想·····	郝宜今(60)
试谈“阿兰豁阿五箭训子”中的哲学思想·····	巴 干(89)
《蒙古秘史》看成吉思汗的哲学思想·····	桑 嘎(92)
试论成吉思汗的天命思想·····	贺其叶热图(100)
论成吉思汗重视“人和”的思想·····	达林太(106)
忽必烈的“变通”思想浅析·····	巴 干(116)
忽必烈对蒙古传统天命观的认识和利用·····	张元明(122)
关于《易源奥义》一书的哲学及社会思想·····	陈少彤(126)
《周易原旨》一书的哲学及社会思想·····	陈少彤(131)
论杨景贤的哲学思想·····	周双利 王 坤(141)
《黄史》哲学思想探讨·····	乌兰察夫(149)

萨囊彻辰思想简论·····	乌兰察夫(154)
萨囊彻辰及其哲学思想·····	额·阿拉坦巴根(163)
清代著名理学家倭仁的《为学大指》·····	苏和(174)
尹湛纳希哲学及社会思想概述·····	布和巴雅尔(180)
试论《一层楼》一书的哲学及社会政治思想·····	阿里 陶格桃 特斯琴(193)
试论罗布桑却丹的哲学思想·····	哈·胡乐歌 乌·朝乐门(210)
对《孙子》与成吉思汗军事理论研究的几点认识 ·····	都固尔扎布(222)
初探成吉思汗军事思想·····	巴音图(231)
试论成吉思汗朴素军事辩证法·····	达林太(238)
成吉思汗兵法与游牧业的关系·····	布林(249)
读《成吉思汗进攻中都的战争》战例体会·····	巴音图(254)
论成吉思汗集中兵力思想在战略战役进攻中的体现 ·····	达林太(264)
学习成吉思汗军事思想的几点体会·····	额尔敦仓(272)
浅论成吉思汗战略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赵智奎(278)
班术尼河之战初探·····	罗旺扎布(288)
班术尼河之战——成吉思汗战略思想初探·····	卓力格图(294)
蒙古族科学家明安图的自然哲学初探·····	包赛音(299)
蒙医三要素和五行说的唯物辩证法的哲学意义·····	敖特·额尔德尼(303)
史诗《江格尔》中的美学思想·····	满都夫(310)
民歌海洋中的哲学瑰宝·····	乌兰杰(335)
用辩证思维探讨蒙古族哲学思想史·····	苏和(350)
关于哲学史的定义·····	宝力格(357)
附《蒙古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论稿》(蒙文版)目录·····	(封三)

继承蒙古族的优良传统 开展哲学史的科学研究

石 峻

中国哲学史学会付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石峻同志来我区参加蒙哲史研究会成立大会，并应邀作了重要学术报告。下面是报告的简要内容。

一、蒙哲史研究是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

蒙古族是我国一个有悠久历史的伟大民族，早在秦汉以前就有文献记载，在我国历史的长期发展中，在军事、政治和文化等方面，都有重要的贡献，并在世界历史上也有着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例如西方古代数学的经典著作欧几里德《几何原本》，最早就是用蒙古文首先翻译传入我国的。我国的“四大文明”也是经由蒙古族从元代开始传入西方并从而著称于世的。当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游记》里详细地记载了元代中国社会的高度文明，引起了西方各国的羡慕，促进了后来东西航线的开阔。在近、现代，蒙古族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作为祖国大家庭的一员，一直起着积极的、重要的作用。因此，继承蒙古民族的伟大传统，开展蒙古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的科学研究，对于建设我国各民族统一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是十分重要的一项内容。

对于蒙古族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在国外，无论是西方和东方，都有着相当长久的历史，有关的著作也很多，其中有不少东西可以补我们史料的不足，特别是关于元代的。当然对这些著作要分析。我们应该放眼世界，取长补短，并敢于纠正、批判外国有关著作的错误。在这一方面，我们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并从而使我国蒙古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的科学研究，走在世界蒙古学研究的前列。我们的专业工作者应该有这个信心和勇气！因为这是我们中国哲学史工作者，特别是蒙古族同志的光荣责任，是可能也应该大有一定作为的。

二、哲学思想史的研究范围应是宽广的

哲学的范围，在古代是比较宽广的，从中国来说，同社会的政治、伦理思想等联系尤其密切。我们研究哲学史，是研究过去的哲学。如果按现在的分法把它弄得过细对研究工作是不利的，也不大符合历史的实际，而且要真正弄清楚当时的哲学思想，离开当时的社会思想，那就会是十分抽象的，甚至无法理解的。哲学是一种高度的抽象，离开了当时的实际

的、具体的东西，那就很可能变为一种空洞的抽象。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必须加上社会思想史乃至科学史，把它们放在联系中去理解，才能弄清过去的哲学思想及其社会意义。

通常科学和哲学是有所不同的。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将古代天文学、医学乃至军事学的著作，直接称为哲学的理论著作，但是通过或借助于这些著作，探索人类认识的历史发展却是必要的，可能的。这就要求我们要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上来进行考察，并从中作出哲学的理论概括。我们的研究范围应该是宽广的。而且这方面的资料从现在看来是很多的，关键在于我们不要把自己的眼光只局限于从概念出发，先从寻找什么是合乎现代哲学定义的著作出发，去进行所谓理论研究。我们应该从客观事实和思想实际出发去从事解剖。

三、蒙古族哲学史研究的重要特点

蒙古民族是有自己的哲学思想的。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人们必然要对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不断地加以总结，在此基础上，当然会产生自己的哲学及社会思想。这是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例外的。当然，有的民族的哲学社会思想，有书本的专门记载，有的则没有或记载不完整，或虽有记载后来却散失掉了。但这只能说是保存形式的不同而已，而不是有没有哲学思想的问题，我们不能以有没有专门的哲学著作来确定一个民族有没有哲学思想。举例说，就是中国古代的大思想家孔丘，自己也没有写过专门的著作，他的《论语》一书，便是他的弟子甚至再传弟子记录下来他的言行，而且也不是专门讲哲学的。古代印度地方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他是现在的尼泊尔人）传说也没有写过什么书，但是现在所谓的佛教经典累计下来，则有成千上万卷。我们不能因此说孔丘、释迦牟尼这些人没有自己的哲学思想，值不得研究。同样，从这个原则去看，蒙古民族也是有其哲学及社会思想史的。

与此相联系，可知研究蒙哲史就不必一定要以古代某一本哲学理论著作或文献记录为唯一对象，而是应该从广泛的各种思想资料出发，去进行研究，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这应该是目前蒙哲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恩格斯利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写出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著作，可以作为我们的楷模。我们也可以通过蒙、藏地区的社会调查，利用包括喇嘛教经卷等各种资料，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撰写出蒙古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的科学著作。

有关资料的整理、出版，也是一项重要的基本建设。我们应该有计划地培养精通古代蒙古文献的专家，以整理、发掘有关的资料。在资料整理和研究工作中，还要注意我国和外国之间、国内民族与民族之间彼此文化上的相互影响和联系。不要把它们割裂开来，孤立地去搞。例如佛教虽然是由印度传入中国的，但是一经传入中国就适应中国当时社会各阶层的需要而有了改造，成为有中国特点的佛教。外来的东西和国内固有的东西，往往有从相互的对立到融合乃至合统的情况。二者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不能简单看待。同样，蒙古佛教和西藏佛教之间应该说也有这种类似的联系与区别，不能只看到它们形式上有共同的一个方面，而忽略了其它。

四、哲学史研究的科学化问题

哲学史研究的科学化问题，就是思想性或革命性同科学性的统一。具体说来有三层含义：第一，要使我们的研究牢固地建筑在客观历史事实和思想实际的基础上，努力做到实事求是，反对任何主观主义、唯心主义。第二，研究方法本身要科学。在学术研究中要逐步建立一种客观的标准，而不能搞“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种“各取所需”的实用主义。这样，才可以防止有关这一方面的科学研究被少数野心家所利用。第三，必须要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则这种研究工作将会走上邪路，对社会主义事业不利。

具体联系我国哲学史当前研究的实际情况，就有关哲学史研究的科学化问题，附带地我讲两方面的意见。

第一方面，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国内外现在大都把哲学放在“文科”，“哲学史”也被认为是“文科”。这当然有一定原因，但是哲学的“文”不完全相同于纯文艺的那样一种“文”。文学艺术可以搞浪漫主义，并且是有其必要的，诗歌和戏剧尤其突出，但是哲学就不可以如此。因为唯物主义哲学是要搞实事求是的，不然就会导致宣扬唯心主义。涉及到中国哲学史，过去许多著名哲学家的“碑”“传”，大多出自过去封建文人的手笔，并且前后相袭，只说好的不讲坏的，隐恶扬善，“为尊者隐”，“为贤者讳”。因此对这些记载我们一定要分析、考证，不可以盲目相信那些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更不可以去模仿。对于哲学思想在历史上的影响，也要实事求是去看待，例如孟轲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果真那个时代社会上的“乱臣贼子”，就如此害怕别人议论吗？我总有点怀疑。此外，还有许多神话的东西，更不可以完全置信。我们一定要尊重事实，破除对古代书本中的记载以及有关传说的迷信，谈到历史上的那些大哲学家都是时代的产物，原本不是什么“超人”，我们也不可以迷信。应该来一个思想上的解放。

第二个方面是其他有关的一些问题。现在大家都感到资料不够用，需要大力地整理、发掘，这是一种客观的要求，是科学研究发展的标志。这确实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但是，将来我们假使有了比较丰富的资料，那末是否就一定作出重大的贡献呢？那也是“两可之数”。如果指导思想不够明确，研究的方向不对头，那也不行。弄不好有的人可能只成为活的“书柜子”，有的人甚至可能制造出一些更加精致的毒品来，因此，研究的指导思想、方向一定要很好地注意。万不能一味拜倒在前人的脚下，而要敢于“推陈出新”，“后来居上”不能没有分析批判的头脑，分不清“精华”与“糟粕”，甚至把糟粕视为精华来加以宣扬。

从中国哲学史研究解放前后几十年来曲折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出发，为了反对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封建复古主义乃至教条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以及简单化庸俗化和实用主义，当前提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科学化问题，是很必要的，既有巨大的理论意义，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据录音整理，标题是编者加的）

谈蒙古族哲学史的研究

陶克涛

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付所长陶克涛同志，专程前来参加蒙哲史研究会成立大会，并作学术报告。这是报告的书面提要。

(一)

在对蒙古族的研究领域里，史事的阐述、古地的核实、典章的考释、名物的辩证、笈录的译校、社会的剖析、经济的检讨、族系的排比、语言的论列等等，至今一直是人们恣意勤于用力的所在，而且应当承认，随着日积月累，这种辛勤是创获既称丰硕，其有益于学科的繁荣，亦人所共知。“百尺竿头须进步，十方世界是全身”。不待说，这样的成果是需要继续努力扩大的。然而在瞻顾这种繁荣的同时，亦不能使人想到：蒙古学中的一块不小的园地，至今似乎甚少为学人所注意，这就是蒙古哲学史。不是吗？学术界迄今为止所作很不完备的有关统计中，无论国内和国外，曾无一篇对它的论著。国际性的蒙古学学者会议，从1959年以来已开过三次，除最后一次有人作了他们国家的哲学发展的报告而外，也不见有另外的消息。这就是一个现实的明证。因此，说蒙古哲学史至今尚属荒外之区，恐怕不见得是过分的吧！“荒外”就是冷僻。蒙古学各学科满堂兴致，独独使哲学史这样一门重要学科向隅，显然是一项缺陷。蒙古哲学史的研究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在我国，首先企望改变这一缺点而特出地倡议蒙古哲学史的研究并列入整个学术规划的，是内蒙古的哲学界。多少年来，特别是近几年来，根据中央的方针政策，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关心下，结合现实的与学术本身的需要，经过社会科学部门和学术界专业人员的努力，内蒙古社会科学阵地，一扫“四人帮”时期独擅“帮”术，摧残百家那种则暗则喻的影响而展现一派生气盎然的景色。“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它不但积极地实践着为人民服务的总则，而且同时也为蒙古哲学史的开拓创造了条件。人们已经看到：内蒙古哲学界同志正是及时地利用这些条件并依据自己所面临的情况，建立起专业的机构，调配了专业的人员，勤勤恳恳地致力于这一领域的探索。几年来，他们经之营之，的确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当然，工作刚刚起步，路途还很遥远，眼前从事这一工作的力量也还嫌少，然而能有意地提出这一课题本身就具有首创意义，能起步就了不起。“朝发轫于苍梧兮，余夕至于悬圃”，只要有了这个“发轫”，我想，经过艰苦努力，不用很久，登上那个哲学史“悬圃”的希望，终究会有的。张协说：“大夫不遗，来萃荒外”，我的确希望学术界的“大夫”们，不遗于此，萃萃然来共同从事这一科目的研究，使蒙古哲学史这一园地亦如蒙古史

的其它各科那样，开花，结果。蒙古哲学史的天地是大有可为的，以为“没有油水”的设想只是“设想”而已。

(二)

研究蒙古哲学史，对于理解蒙古历史具有肯定的意义。1834年，德国诗人海涅曾说：

“法国人最近读了一些我们的文学作品，就以为能够理解德国了，然而他们借此只不过从完全无知的状态，刚刚上升到问题的表面。因为他们只要不理解德国宗教和哲学的意义，我们的文学作品，对他们仍是一些默默无言的花朵，整个德国思想对他们仍是一个拒之于千里之外的哑谜。”（《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第十一页）。

蒙古的哲学史当然不能等同于德国的哲学史，甚至也不能望其项背，然而假如有人愿意遵照古书所谓“启乃心，沃朕心”的训示，从重视哲学史这个角度出发，把这位激进民主主义者的话，加以引申而套用在蒙古民族身上，说仅仅读一些关于蒙古的文学作品，并不是以理解蒙古这个民族的历史，只要不从哲学上理解蒙古史，或者说，只要不理解蒙古哲学史的意义，蒙古文学作品不过是无声的花朵，整个蒙古历史的思想依然是隔膜的，也许不是全无启沃的吧！

蒙古哲学史的研究，对于加深蒙古历史发展的了解大有裨益。马克思曾经提出：

“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例如，与权威原理相适应的是十一世纪，与个人主义原理相适应的是十八世纪。……但是，……为什么该原理出现在十一世纪或者十八世纪，而不出现在其它某一世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一，第一—三页）。

这就需要调查研究产生这些原理的经济基础和思想根源，对于蒙古历史情况亦须如此。在考察蒙古历史思想的演变时，除根本地从经济基础中去找原因而外，亦须向思想本身去探溯，就是说，须要研究蒙古哲学史。从蒙古哲学史的探讨中，人们不但有可能了解在特定历史时期蒙古人社会活动的思想渊源，即他们的活动是在怎样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或者说，哲学思想是如何反作用于人们的社会实践和自然界的实践的，从而了解到为什么有些历史经历取得了成功，而另外的活动却终于告败；而且也有可能使他们了解到某种哲学思想本身又是在怎样的思想影响下形成的，从而使人们有可能了解到蒙古哲学思想的连续性和与其它各民族思想的关联性。正是蒙古哲学史的研究，才可能有助于把握蒙古民族意识和传统的形成和特点；也正是蒙古哲学史的研究，才可能有助于去鉴别和扬弃历史上积累起来的那些理性的精神财富或糟粕。

赵紫阳总理在《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中指出：

“我们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精神文明的范围很广，它的主要内容必须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教育，科学、文化、艺术、卫生、体育事业的发展规模和发展水平。……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政治思想和伦理的发展方面和发展水平。”

作为祖国哲学史一部分的蒙古族哲学史的研究，正是这种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之一。它有助于提高人民爱祖国、爱人民；有助于发展和繁荣优良的民族文化。以为蒙古哲学史的研究无关于当前的社会主义实践的观点，不是全面的。

(三)

蒙古民族有没有哲学和哲学史，听说曾经有人提出过怀疑。我以为对于这样的怀疑本身不应当更有怀疑而应当理解。蒙古这个民族虽然有了较久的历史，并且也曾开放出自己的文化之花，然而长期以来历史条件所给予它的贫困、屈辱，直到解放时为止，尚没有使它孕育出自己成熟的专业哲学家，没有哲学的讲坛，也没有系统的、专门的哲学经典，至少在今天还没有发现这些方面的文字记录。当人们迫不及待地以这样的表象与别的先进民族相比时，发现蒙古民族并没有它的“亚里士多德”；它的“吕克昂”；它的《论灵魂》，也没有发现它有它自己的程、朱学派；它自己的“经学院”；它的四书五经，因而持疑乃至不相信蒙古有可资研究的哲学史，那或者是十分自然的，然而据我看，不妨从另外的或者说从哲学史本来的意义上理解。什么是哲学史？

列宁曾经指出，哲学史“简单地说，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列宁全集》，卷三八，第三九九页）。依据这一公式，说蒙古哲学史，简单地说，就是蒙古人整个认识客观世界的历史，也许不会有太大的偏差。事实上，蒙古人亦如任何别族的人那样，他们的历史活动也是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对他们来说，也有意识与存在、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问题；也有认识过程的产生、发展；也有由感觉到理性到实践的历史；也有特定时期的特定思潮对另一特定期特定思潮的承继、演化的历史，怎么可以忽视这样的历史过程？不能设想：列宁的上述定义不适用于蒙古历史。

作为一种独立的学科，蒙古哲学史也是蒙古阶级社会和阶级斗争的产物。蒙古民族从其进入阶级社会之时起，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乃至统治阶级内部，就不断地进行争夺阶级利益的阶级的斗争。为了战胜对方，各阶级在使用一切必要的政治、经济、军事手段的同时，也百般地寻找和制造思想的或理论的武器，哲学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之间的分野与斗争，正是这种阶级斗争的反映，也正是作为这种阶级斗争的武器而出现的。一部阶级斗争史也正是一部哲学斗争史。不能说，蒙古没有进入阶级社会，在这一社会里没有阶级斗争，或者说，蒙古社会的阶级斗争没有思想性；没有哲学形态因而也没有自己的哲学斗争史。

事实上，蒙古民族也不是没有可供哲学家借以研究的文献的。自然，还没有现代意义的哲学史“教程”，没有这样的讲义和编年，然而这没有什么可笑的。当一些古文明民族以丰富的文字记录贡献于人类的时候，它们早期的著录中也未必有专门的哲学典笈。正如很多哲学家同时就是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宗教家一样，不少典笈是哲学撰述，同时也是政治、军事、语言、文学、宗教以及医药等等的读物，看你从什么角度去着眼。蒙古民族的情况亦颇类似，很多即使形诸文字的创作，其内容也不简单，是历史著作，而同时又是文学的、军事的、宗教的和哲学的记录。其所以出现这种景况，除了一切原因之外，与蒙古民族直到解放为止，始终处于前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状况不成熟、科学技术不发达、社会及科学分工不清晰有密切的关联。恩格斯说：

“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四〇九页）。

资本主义社会尚且如此，前资本主义状况不是可以举一隅而反三吗？然而哲学理论的不成熟不能等同于不可能研究，更不能等同于没有。人们应当知道，在蒙古的早期著录中，一些哲学范畴已被闪烁地提出。在成吉思汗时代，已经提出了善与恶、天与命，人生的最高理想与世界的演变问题，在其后的年代里，亦有不少理论观点萌芽，遗憾的是以往缺少这样的研究。

（四）

蒙古哲学史从哲学这个角度说，它与任何（一般的）民族的哲学史的规律、概念等，不见得有什么不同。它与一般哲学史有其一致性。然而从蒙古这个民族看，它也还是应当有它的特点和具体情况。从一般中看它的特点，从特殊中找它的普遍性，我想，这不妨可以当做在蒙古哲学史研究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一个方面。

对蒙古学史的研究，不宜离开蒙古民族全般历史的发展，哲学史的历史分期固然要尽可能适应整个蒙古历史的分期，而哲学思想的演化亦无需脱却整个蒙古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形势的发展——尽管二者不能简单地等同起来。在我看来，以下几点或可权作蒙古哲学史研究中不应忽视的参考线索：

一、需要研究前代。蒙古民族并不是突兀出现于蒙古地方的。在它以前，依次上溯，曾有女真、契丹、回纥、突厥、柔然、鲜卑和匈奴。他们长期在这一地区活动的结果，不但为后世留下了可资凭用的物质财富，也有一定的精神遗产可供后世接纳。蒙古作为它们的集大成者，不可能不受这些前辈们所创造的条件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经典指出：

“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五一页）。

又说：“我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四七七——四七八页）。

据此，则研究前代所铸成的那些“前提”和“遗产”，乃是研究蒙古哲学史所必不可少的步骤。不研究这些，就可能被理解为割断历史，其必然的结果不但将导致无法理清蒙古哲学史的始源与传统性；亦且影响到蒙古哲学史发展的特点与程度的探索。因此，蒙古哲学史除了在时序上要溯及从匈奴以后的整个历史年代而外，在内容上也应概括上述各个民族的有关资料。从这个意义上讲，说蒙古民族哲学史也意味着蒙古地方历代游牧民族的哲学史，也不无理由。

二、不能忽视四境各族思想的影响。蒙古民族的历史活动，从来不是孤立的。随着它的兴起、发展与衰落，它与四邻的关系也在不断地变化，而其中与长城以里的关系尤其占有重要的地位。从匈奴时代开始，中原文化就已经溢出北方关塞而播种于蒙古高原，其影响所及，历千年而不绝。游牧人学习内地文化，派子弟到内地留学，而汉人出边，汉书译为蒙文的亦所在多有。在这种长久的文化交流中，既有各种文化知识，也有不同的哲学思想，而所谓“儒”家思想尤显得分外出色，至少它在历代各游牧族的统治层中具有重大影响。辛亥革命以后，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一些民主主义思想之进入蒙古、汉地和汉族又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源地和媒介。这样的思想一旦深入蒙古，与其它各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就不可避免

地发生能动的影响，并构成了蒙古哲学思想史不能缺少的部分。这恐怕是无可否认的史实。但是，这种思想为什么能够深入历代各游牧民族，它是以怎样的形式出现而又表现了怎样的特点，并且它又是怎样见诸实践以发挥其对基础的反作用的，长期以来，却不曾在学术界作过很好的研究。而正这种研究应当成为蒙古哲学史的一个篇章。

自然，苏俄十月革命以后，蒙古人也接触了科学的哲学思想，而随着日本“满蒙”政策的推行，法西斯主义哲学也曾浸淫于蒙古地区并曾发生了作用。对于这样一些历史现象，也不应排除在蒙古哲学史的研究范围之外——虽然不能夸张这种影响。

三、恩格斯曾说：“东方的历史表现为各种宗教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八卷，第二五五页）。这是一个极大的启示。宗教，主要是佛教（喇嘛教）在蒙古高原具有悠久的弘通经历。柔然时代，蒙古高原已有了佛徒的“加兰”。其后，尽管民族有衰替，而北方统治者之扶持佛教，不曾稍歇。自元及明约三百年间，红教曾是主要的教派，明末以后，黄教风靡蒙古。恩格斯说：

“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二五一页）。这话恐怕也适用于蒙古。喇嘛教的统治者由于占有大量的生产资料，并与蒙古的封建统治者勾结在一起，以宗教鸦片放肆地毒化蒙古民族。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宗教哲学成了统治哲学。从清末以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蒙古民族无论其社会经过、政治制度有过多么的变化，而这种“鸦片”及施行这种“鸦片”的寺院，教主及思想影响并无几许根本变化。在欧洲，“一般针对封建制度发生的一切攻击必然首先就是对教会的攻击。”（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第三二页）。这种情况对于蒙古似乎不很适用，内蒙古即使兴起“启蒙”运动，对于宗教及其哲学也不曾毁及它的皮毛。蒙古民族之所以“有下降的时期”，除了种种原因外，没有从宗教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是一不容轻视的因素。然而宗教为什么能在蒙古普及，它以一种怎样的思想手法败坏人们的世界观等等，至今尚需作科学的剖解。绝不能低估宗教对于蒙古的反动作用。对它不宜有“两点论”，——以为“鸦片”中也有可吸取的营养成分。

四、“每个民族文化里面，都有那怕是不大发展的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里面都有劳动的和被剥削的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地要产生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蒙古哲学史就是要发掘和总结这样的思想体系，使它发扬光大。这样的思想存在于历史、文学著录中，也大量地散布在蒙古的《伊索寓言》中：存在于巴拉根仓的笑话中。

为了表彰人民的、革命的思想，必须揭发、批判封建的，反动的哲学思想；不能把两者混同起来。以为蒙古民族只能有一部金光灿灿的哲学史，什么都是美妙的，并不是可取的观点。

历史的问题要历史地看。从十七世纪到解放时止，蒙古民族总的历史命运是被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大民族主义所压迫。这是以往党的文献所屡次指出过的。这种压迫实际产生了反抗和妥协的实际，而“反对任何民族压迫的斗争，无条件地是正确的。”（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一切反抗压迫的思想都是正确的思想，因此，一切妥协的、投降的思想都是唯心主义的思想。民族意识在那时是可以肯定的精神力量。恩格斯曾经针对德国的情况说：

“大宗钱财就是这样年年从德国流入罗马：由此而增的重压不仅加深了人们对僧侣的憎恨，而且激发了民族意识，特别是激起了贵族们的民族意识，……。”（《德国农民战争》、第二四页）。

在这里，“民族意识”甚至是贵族们的民族意识，也是被当作“重压”的对立面而出现的。蒙古贵族很少有什么蒙古民族意识，然而他们中间的分化分子所具有的旨在反抗“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的“民族意识”，不必骤作贬词。

五、近代、现代的思潮的研究，应在蒙古哲学史的研究中给予更大的比重。二十世纪初，特别是从“五·四”运动开始，内蒙古民族的历史也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换期，民族危机日深，人民的困苦累加，而人们的社会或政治思想亦日趋复杂。当代的世界怎么样，蒙古的出路又如何，亦如政治领域的斗争一样，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也是分出了不同的哲学派别的。对于这些斗争应当加以研究。

随着整个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亦和全国人民那样，蒙古人民，首先是农业区的人民的政治觉悟日趋提高，城乡知识分子在接受与传播先进的、革命的理论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每一次全国的革命浪潮中，蒙古的知识分子都深入群众，实践着他们的进步思想，而每一次的这种实践也就是革命思潮的大普及。这种普及为革命形势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不少这方面的先行者，在蒙古的思想斗争史中应占有地位。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

“……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毛泽东选集》，第七九八页）。

对近代、现代史，包括文化史（内中也有哲学思想史）缺乏研究的这种状况，无疑也体现在蒙古史的研究上，这是应当补正的。

建国以后的三十年是内蒙古历史的新时期，反映在蒙古哲学史上则应当列为新的篇章。经过十年浩劫，人们开始在思想上提出：这一时期的所作为究竟对不对？为什么对或不对？关于前者，展开了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大大解放了人们被禁锢的脑筋；关于后者，中央又做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正确认识三十年作了精辟的阐述。毫无疑问，蒙古哲学史学界正是需要根据中央决议的精神，逐步提出和探索这一时期实际存在的哲学问题和理论问题，以使哲学史的研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实践服务，使蒙古哲学史的内容更加丰富起来。

六、毛泽东同志曾说：

“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毛泽东选集》，第五二二页）。

这里既说了时限，又说了办法，这个指示当然也适用于蒙古哲学史的研究，就是说，对蒙古的历史，也要从古代到近代，在理论上（哲学思想上）给以“总结”，即从历史真实出发、从大量的实际资料的分析中，给以马克思主义的归纳、找出规律，吸取经验，而不祇是孜孜于哲学概念的解释，空洞的、抽象的理论争辩和用蒙古以外的情况作不见得妥当的比拟、搬套。为此，除不断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武装我们自己而外，加深蒙古历史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成吉思汗曾宣示他的“素志”说：“我登阿尔泰山以望已营，我军之多如林，从军之

女，亦可成队。我愿其口履甘肥，身履文绣，居得华屋，牧得腴地，道途之内，荆棘不生。”（《元史译文证外》，卷一下）。他一生的实践是否真的对此作了证明，可以研究，然而这些话本身却表明他的人生观所在。以后，他又“教戒”后代：“但知鲜衣美食，乘骏马，拥娇姬，则将忘我等开创之功。”（同上书）。在这里，他提出了他的历史预见，其后的历史经历真的证实了他的这项“教戒”。他死后，没有多久，所谓“大汗国”即开始一步步分裂，他所“开创”的功业不断地萎缩，仅能自护，尔后自保亦不得，竟致沦替，终至屈膝向别族统治者“上书”，尊之为蒙古大汗。回溯蒙古以前历史，给人的印象：十七世纪以前，这个民族已在走“下坡路”，长期的军事行动招致了自身的苦累，然似乎尚有这点进取精神，而从那以后，则走到了坡底，社会风气，几乎一派颓唐。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自然很多，历史家们尽可以全面研究，然而就社会思想这个角度看，哲学理论界的任务，恐怕就义不容辞了。马克思曾说：

“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四二五页）。

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哲学史破除对蒙古历史的“迷信”，这是一种了不起的繁重而艰苦的工作。它甚至是超过了“启蒙”这个意义的。

（五）

党的六中全会号召：“要在全党大大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对中外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对各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蒙古哲学史的研究应当看作是党中央这一号召的具体实施，我想，这是很光荣的。

蒙古哲学史，当作史事说，它已是早就存在的，是一个老问题，然而从人们对它的工作看，却是一项新问题。无论就全体规模说，或就其局部分析看，过去都没有认真探究，既没有来得及积累资料，也没有相应地总结过经验，一切免不了要从头做起。马克思在《资本论》初版序文中说：“一切事的开头总是困难的。这一句话，在一切科学上都可以适用。”所以从事这一工作的同志们都可能已做了克服困难的精神准备，我看，这是唯物主义的。就是要用唯物主义的、科学的态度研究蒙古哲学史。

研究的规划总是需要的吧，因为你总要有个战略性的考虑，以便安排力量、确定办法，具体入手。对于集体或个人，这一步恐怕均不免。对于个人说，当然更应有具体的实施方案。

冒然地说，蒙古这个民族似乎并没有什么哲学“经典”，然而如果把所谓“经典”理解为文字记录的文化遗产，则“经典”还应当承认是有的，问题不过是或散或佚罢了。清人讲：“经学”，无论主实证，讲义理，大概都注重三件事：辑佚、校勘、训诂。我们现在攻治蒙古哲学史，似乎也要走这一步。这虽还不便认定就是在攻治哲学史，但却是它的前提。因为这是资料，是研究的对象，无此或有此而不真、不全、不清，研究是无从谈起的。所以我想，是不是把资料工作放在头里更好一些。

自然，在资料完备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并努力写出作品来，这也是大家的期望，孔夫子不得已而著述的态度，不是今天应当学习的态度。但是，在草创时期，也不必急于求成、求

大，能在一个方面，一个专题上狠下功夫，取得进展也是可喜的，应当鼓励这样的努力。

正如很多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工作一样，蒙古哲学史的研究也是一种首创性的劳动。这里不光需要细心，也需要大胆。畏首畏尾，守默守雌，自设禁区，云人所云，是无法有所发明的。马克思曾说过这样的话：

“在科学的入口处，正象在地狱的入口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

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八五页）。

在对蒙古哲学史的研究中，我想，应当有这样的精神。这种精神有助于解放思想，无碍于打破老框子。

内蒙古蒙古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研究会成立了，这是一件好事。它标志了内蒙古学术界新阶段的开始。在研究会的组织和推动下，蒙古哲学史坛必将盛开香艳之花，为祖国的学术园地增添光彩。

去年，几个民族的哲学和社会思想史学界倡议成立了北方少数民族哲学社会思想史学会，以帮助北方地区诸少数民族开展有关这方面的学术研究。我想，蒙古哲学史的研究必将能极大地丰富这个方面的学术活动。

关于《蒙哲史》方法论的几个问题

蒙和巴图

从我们刚刚着手研究《蒙哲史》的时候起，就有些人对之发出了种种议论。如：蒙古族“有无哲学”，研究《蒙哲史》究竟有“多大油水”，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还研究《蒙哲史》干什么，等等。这些问题，就其一般意义来说，也就是什么是真正的哲学，研究哲学史的目的和意义究竟应该是什么的问题，而这历来是各种哲学史观分歧的焦点。

黑格尔说过：“哲学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与别的科学比较起来，也可以说是一个缺点，就是我们对于它的本质，对于它应该完成和能够完成的任务，有许多大不相同的看法。”因此，“只有当我们能够提出一个确定的历史观时，历史才能得到一贯性，不过由于人们对它的题材有许多不同的看法，这样就很容易引起片面性的责难”。^①这里说的“一个缺点”和“片面性的责难，实际上是哲学和哲学史观的党性表现。在这个意义上说，他这段话所说的都是哲学史上的事实。所以，我们认为，上述就《蒙哲史》研究工作提出的那些问题，也“只有”提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上来讨论，才可以企望得到正确的解决，否则也会永远纠缠不清。下边，本着这种想法谈谈个人的浅见，以抛砖引玉。

一、蒙古族“有无哲学”？

人们都承认，哲学是人类文明社会的产物；也知道蒙古族在世界文明史上还不是“无名小卒”。因此，这个问题必然会引起另一些深入问题实质的提问：哲学究竟是为人们用来干什么的学问——是一般文明生活的必须品，还是高级文明生活的奢侈品？如系前者，它在历史上形成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什么？它在历史上的各该条件下形成的外表形式是怎样的？这些问题弄清楚了，才可以求得本题的正确答案。

那么，什么是真正的哲学？

如前所述，这是各种哲学史观的理论前提，因而围绕这个问题曾提出过种种见解。如在国内，就汉族哲学史提出过汉族哲学“晚出”论，“特殊（畸型）”论等，这是和古希腊哲学以及近代西欧哲学相对比而提出的；在国外，则有日本“无哲学”论，日本哲学“侏儒”论等，这是和中国汉族哲学、印度哲学以及整个欧洲哲学相对而提出来的^②，如此等等；而这些也就是说，被用来做为对比标准的才是真正的哲学。现在我们遇到的所谓蒙古族“有无哲学”的问题，也仍然是这样对比出来的问题。

这些提问，虽然就它们的具体标准看来差距很大，可是就其基本原则来说却都是一致的，即只是直观地对比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哲学思想，而不去深入观察它们在各自历史条件下是否解决了哲学本应解决的实际任务。也正由于这样，这种直观性原则在具体标准上就必然显

示出很大的主观随意性。由此可知，上述这些见解，很显然是黑格尔哲学史观的盲目搬套。

黑格尔说过：“只有真的哲学概念，才能使我们理解那些根据哲学真概念从事工作的哲学家的著作，”③这种“真的哲学概念”，在他看来就是：“凭籍理性的力量深入事物、自然和心灵的本质——深入上帝的本质，并且为我们赢得最高的珍宝、理性知识的珍宝”。④他以这种“真的哲学概念”为根据，考察哲学史的结论则是“整个来说我们有两个哲学：希腊哲学与日尔曼哲学。”⑤此外，包括“印度和中国哲学”在内的其它各国哲学，都“必须排除在哲学史以外”。⑥这就是说，在黑格尔看来，人类哲学意识形成和发展的“二千五百年”的世界文明史上，只有古代希腊和近代德国才产生过真正的哲学，而其余的迄今生活在五大洲的上千个大小文明民族都未有过真正的哲学！可见，这种“真正的哲学”，比起上述那些可算是最为神圣的了！

然而，所有这些未能获得那种“理性知识的珍宝”的绝大多数文明民族，是怎么渡过这充满了尖锐而复杂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历史长河而生存下来的呢？黑格尔的解说是：那些过着较高文明生活的各民族，如“意大利、西班牙、法国、英国等国家都曾因日尔曼民族而得到一个新面目。希腊文化也透入到罗马世界里面……”。⑦其余那些，则只是过着一种“不是建筑在主观自由上的”，而是“僵化”了的文明生活！如此说来，黑格尔说的这种真正的哲学，只可以在已经发展到较高阶段的文明社会生活中形成，并向较低的文明“透入”，却无能在一般文明生活中产生，并把它推向更高阶段。那么，产生这种既神圣而又无能的哲学的古希腊和近代德国的较高的文明，又是怎样从它们以前的较低的阶段上升起来的呢？那里是否也曾有过在某种程度上神圣的哲学起过它应有的作用呢？如是，那么它们这两个民族又何以能如此得天独厚呢？！黑格尔对这些问题的最终答案，是人们众所周知的；然而，上述搬套他哲学史观的那种见解，却在这一点上充分表现了盲目性；尤其明显地是，提出“侏儒”论的日本学者，竟把黑格尔的“透入”论抄袭成了“移植”论！

黑格尔的哲学史观，靠了他深刻地辩证法内容，可以说是驳倒了在他之前的各种非历史主义的哲学史观，从而获得了理论上的权威；然而，这个深刻的辩证法是被局限在它唯心主义体系之内的，因此在哲学史上也和在整个历史领域那样，历史的发展到了这一限度就停止了，所以这种哲学史观也终归既不能解释哲学史的全面情况，也不能按它的内在逻辑自圆其说——它要从哲学神秘论的死胡同里走出来，又会落入哲学无用论的烂泥坑！

马克思在评述哲学史上的这类事实时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⑧这是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因而也是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最严重的通病；因而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分歧的根本焦点。列宁在阐述这种分歧时写道：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也正是由于这样，“遵循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永远不会穷尽它）；而遵循着**任何其它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⑨

那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说来，什么是真正的哲学？马克思写道：“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各种外部表现证明哲学已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界——这样的外部表现在所有的